



近代湘籍政治家思想研究

# 蔡锷思想研究

◎ 邓江祁 /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获湖南省中国近现代史国家重点学科资助

近代湘籍政治家思想研究

# 蔡锷思想研究

◆ 邓江祁 著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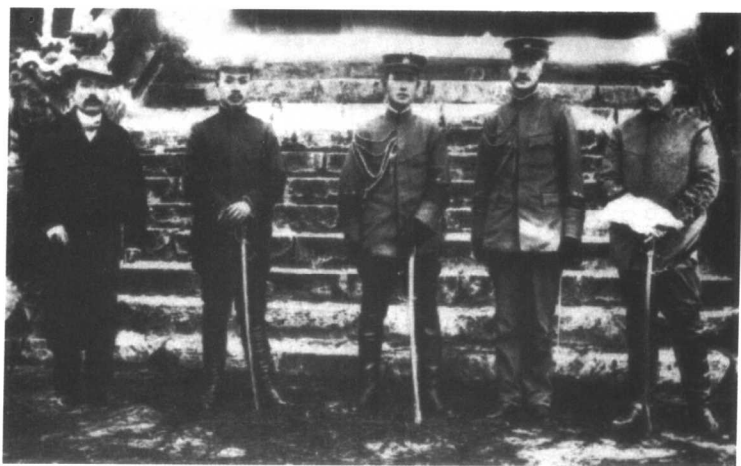
◇蔡锷（1882-1916）



◇蔡锷故居（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



◇1915年初冬，蔡锷（中）与戴戡（左）、陈敬铭（右）  
在北京密谋讨袁时合影



◇云南护国军部分将领合影  
(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琳、李烈钧)



◇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的蔡锷

吾子之所謂長成而後用者。非謂其必大。惟其  
低人。主權和。誠。誠。最難。而。最。人。中  
果。三。數。人。身。先。引。色。翻。書。義。家。是。時。今  
日。後。作。人。者。主。權。中。東。主。義。英。德。東。保。一。流。在  
後。下。一。針。孔。而。為。此。東。海。一。棒。棒。未。知。其。善。而。難。也。

◇蔡锷军中遗墨

止

能讀法五能操操算也余素抱以身行道之志此次  
尤為快心第一易解神暗弄我卿死疆場決不  
所憾但自交生平一筆剛性華余之行而表友有  
嘉費滿盈之象至是相中國其見以梅園其而休  
命也川中軍政時存防情甚冷昨來老翁事余  
如金月之旦云云但川省六部連年一付係為解脫代  
易之平一付係為一詢

蔡  
一九一五年一月廿五號



◇蔡锷家书

◇蔡锷和他的长子端生



◇蔡锷墓（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

## 《近代湘籍政治家思想研究》丛书序

饶怀民

近代湖南人才蔚起，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的。应当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近代湖湘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解析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是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

### —

恩格斯在谈及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曾经说过，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近代湖湘文化固然是湖南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必然是在“已有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的。追根溯源，它是由古代湖湘文化渐次演变而来；同时又吸取了西学的养料，使之得以充实和发展，因而它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它植根于湖南这块土地，使它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征。

古代湖湘文化的形成严格地说应当始于湖湘学派。早在南宋初年，福建崇安人胡安国及其季子胡宏在宋高宗建炎年间因避战乱来到湖南衡山隐居，创建了碧泉书院、文定书堂，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开创了湖湘学派；嗣由胡宏的高足四川绵竹人张栻加以阐扬，乾道初，张栻主讲岳麓书院，著述宏富，造诣极高，他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号称“东南三贤”，其弟子甚众，成大器者颇不乏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派。胡氏父子及其门人虽然都不是湖南人，但他们隐居湖南，长期在湘著书立说，故他们创立的学派习惯上称为湖湘学派。对此，历代士人早有论评，他们一致承认：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的一个派别。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干脆将这一学术派别称为“湖湘学派”（黄宗羲：《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近代史学大师梁启超则明确宣称这一派为“湖南一派”。由此可知，南宋时期，在洞庭湖之南的湘水流域确实存在着一个“影响后世很深”的湖湘学派。

文化是有其传承性的。湖湘学派所开创的优秀的学术传统和治学风格并没有因为历史长河的变迁而中断，而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一文化摇篮里茁壮成长。至明末清初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王夫之，王夫之就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毋庸讳言，就王夫之思想体系的理论渊源而论，是以张载的“关学”为前导的，而关学与宋明理学其他各派又是相互联系的。众所周知，宋明理学各派由于其社会功能和作用大小不同，分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加上邵雍、张栻以及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主流派；王安石、苏轼、吕祖谦等为非主流派。而主流派中又分出正统派，即濂、洛、关、闽四派。周敦颐，湖南道州人，首创濂学，成为理学之祖；张载讲学关中，其学被称为关学；张载的表侄二程兄弟初受学于周敦颐，嗣讲学洛阳，其学被称为洛学；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继承二程学说，并综合张载的一些观点，系统地阐述并发挥濂、洛、关学，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由于他长期在福建讲学，故其学说称为闽学。南宋后期，朱熹的学说受到推崇，历久不衰，成为元、明、清各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而张载的若干著作在明初也被编入《性理大全》，列为士子的必读书目。王夫之的思想体系虽以关学为前导，但也从朱熹的闽学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故有王夫之“归宿于闽”的说法。闽学与湖湘学均研习和阐发二程学说，虽有“见识少异”的地方，但通过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以及与张栻的书信往返，反复“讲磨辩难”，两人经过十多年的探讨，其学术观点终于“以一其归”。既然王夫之“归宿于闽”学，那么，认为王夫之“归宿”于湖湘学亦未尝不可。其实，只要将胡安国父子及其门人与王夫之进行比较，至少在下列几个方面有相同之处：一是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及抗敌御侮的政治态度相同；二是他们吸取众家之长，不偏一说的学术思想相同；三是他们崇尚实学、不喜空谈

的学风相同。这种抗敌御侮的政治态度、不偏一说的学术思想、崇尚实学的学风，由南宋湖湘学者所倡导，经过“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代代相传，连绵不断，至明末清初，由王夫之大力阐扬，历久而常新，影响了历代士子，在湖南境内士人群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即在政治上主张抵抗侵略，反对卑躬屈膝，宁愿牺牲自我，也决不向恶势力屈服，表现出政治上的坚定性；在思想上主张追求真理，一旦形成自己的思想，就不愿轻易改变，反对随波逐流、与世浮沉，表现出思想上的坚毅性；在行动上主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不怕困难，百折不挠，反对投机取巧、畏首畏尾、言行不一、浮而不实的作风，表现出行动上的坚韧性。这种共同的文化心理反映在性格上便形成了湖南人特有的性格：刚正质直，勇猛强悍，桀骜不驯，好胜尚气等等。

然而，人才难得，大批人才的涌现，毕竟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培养和痛苦的磨炼过程。当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以后，湖南境内才出现一个人才荟萃、群星璀璨的崭新局面。正如王夫之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吸取了前人已有的思想养料一样，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又从王夫之那里吸取了精神养料，王夫之的思想和学说广被三湘四水，哺育了湖南一代又一代人才。诚如杨毓麟所云：“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杨毓麟：《新湖南》）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都是王夫之的崇拜者，他们皆以王夫之的继承者自命，谭、唐正是接受王夫之思想影响而踏上改革之路的。辛亥革命的领导者黄兴、宋教仁、蒋翊武等人都是由“爱读《船山遗书》”并从阐扬民族大义出发而步入革命征途的。至于蔡和森、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青年时代也认真钻研过王夫之的著作，他们早年的革命团体还是以“船山学社”为其掩护的；毛泽东还在“船山学社”社址创办过湖南自修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代新人。

毫无疑问，导源于古代湖湘文化及由此而孕育出来的湖南士子特有的共同文化心理是近代湖南人才蔚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近代湘籍政治家群体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

文化是有其时代性的。中国近代文化不是孤悬于世界近代文化总体之外的单一体，而是一个包容中西文化的复合体。近代湖湘文化作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分支，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会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因此，它并非一种封闭型文化，而是一种开放型文化。明乎此，考察近代湖湘文化必须将其置于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西学东渐纵向发展的历史中去进行考察。从这一观点出发，近代湖湘文化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后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称为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文化。经世派代表人物有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唐鉴、汤鹏、邓显鹤等人；洋务派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曾国荃、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尽管经世派与洋务派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也存在较大差别，但是，无论是经世派，还是洋务派，他们都比封建顽固派高明得多，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在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上，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洋务派可以说是经世派的继承者，洋务派所遵循的“中体西用”观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闭关锁国的封建时代，魏源大胆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是需要胆略和勇气的。魏源不愧为我国近代史上具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改革家！洋务运动的开展，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为整个文化运动的运演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阶段，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至辛亥革命为止，称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文化。维新派代表人物有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沈荃、樊锥等人；革命派代表人物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谭人凤、刘揆一、刘道一、杨毓麟、禹之谟、宁调元等人。这一阶段

以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和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为契机，湖南维新派、革命派也相继登上政治舞台，这两个政治派别分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他们在更高层次、更广泛的范围内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开始冲破单纯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界限，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西方政治体制上；他们在继续宣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维新派主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革命派则主张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虽然这两个派别所要建立的政体不同，为实现各自追求目标而采取的斗争方式也不相同，但是，他们所要建立的政权都属于资产阶级政权。在维新运动中，被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为变法而流血、血洒菜市口的英雄气概曾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为匡救神州陆沉、毅然率领自立军志士发难于汉口的唐才常因谋泄而引颈就戮的献身精神又给人们以深刻的刺激。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家大都经历了由改良到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他们正是吸取戊戌变法和自立军起事失败的教训而毅然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湖南在维新运动中之所以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之省份，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开“内地革命先声”、并成为“首应之区”，是与湖南维新派、革命派代表人物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

第三阶段，从辛亥革命失败至五四运动前后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时期，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文化。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李达等人。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它推翻了统治中国 268 年之久的清王朝，从而也就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大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们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仍然使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于是，先进的中国人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顺应时代潮流，一场以

批判旧思想、旧道德、重建国民精神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了！当新文化运动开始酝酿的时候，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创刊。该杂志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新青年》等刊物的出版，对青年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很快为湖南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1918年湖南第一师范学生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成立了以提倡文化革新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坚组织之一。嗣后，毛泽东等人创办文化书社，通过阅读和发行《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劳动界》和有关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开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了湖南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近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反映这种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进。湖南近代各个文化阶段代表人物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从科学技术层面到理论制度层面到思想意识层面的由浅入深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对西方文化精华的吸取也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过程，从而形成了它自身发展、演进三个阶段的稳定结构。湘籍政治家群体也正是伴随着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演进而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

### 三

近代湖湘文化继承了古代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的精华，它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对近代湘籍政治家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湖湘文化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士人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大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魏源的《圣武记》写“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其《海国图志》编撰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海国图志原序》）。左宗棠认为，《海国图志》乃是魏源“发愤而作也”。著名外交家曾纪泽毅然赴俄改订崇厚与俄国签订的卖国条约，“探

虎口而索已投之食”，被誉为清季外交史上“罕见的一人”。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则甘愿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督办唐才常从小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辛亥革命时期的湘籍志士大都为救国而放弃举业，投笔从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志愿，1920年，毛泽东在讨论新民学会的宗旨时，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并毕生为之奋斗。

第二，民心刚正质直，士人大都讲求和注重气节。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留日学生赴日途经武汉时，张之洞派人授意，接见时必须行跪拜礼，宁调元等人执意不从，并表示：“挽回国运，当从提倡气节始，吾辈当求学之日，即奴颜婢膝，以曲顺当道，将来宁有冀耶？”（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时，宋教仁辞农林总长职，袁世凯馈赠以五十万元支票，企图收买他，宋教仁派人退回，并寄函表示：“惠赐五十万元，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蔡寄鸥：《鄂州血史》）表现了一个革命家贫贱不能移的操守。“宋案”发生后，时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即以“多病”为由，呈请辞职，诚如当时记者所评论的：刘“实系洞悉‘宋案’之真相，不愿再厕身于万恶之政府中，故托故辞职。”（姜泣群：《渔父先生恨史》）蔡锷亦不受袁的诱感和拉拢，辗转至滇，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第三，民性朴实勤勉，刻苦耐劳，勇于任事，具有一种实干精神。魏源一生勤于著述，他编撰的著作现存的尚有一千一百多万字。黄兴更以埋头苦干而称颂一时，他一生领导了十多次武装起义。1912年，他曾书示其子黄一欧，以“笃实”二字相劝勉。谭人凤“尤厌清谈”，黄花岗起义时，已经51岁了，还要求参加“决死队”；他在沪养病期间，得到武昌首义的消息，即带药饵出院，至武汉后，“昼出洪山，夜宿武昌”，先后担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对于武昌战局的稳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蔡和森深愿“今日之中国多出做事之人”。毛泽东特

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一书。

第四，民风强悍，士人大都具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和投身政治洪流的献身精神，不仅敢于忘生舍死，而且死得英勇壮烈。戊戌政变发生后，有人劝谭嗣同出逃，谭谢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慷慨就义。庚子自立军起义事泄，张之洞对唐才常“雅重之，且固闻是谋，初得谍报，故迟不发，阴纵令脱。”唐才常厉声曰：“事之不成，有死而已，唐才常岂苟脱者？”“犹坦然自若，笑而受缚，无难色。就义之候，慷慨如平生，临绝，则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胡石庵：《烈士唐才常事略》）遂与林圭等二十余人同及于难。甲辰长沙起义事泄，马福益被捕，临刑前，他慷慨陈词：“我一人杀头，有四万万同胞接踵而起，只要冤仇得报，死而无怨。”（蔡寄鸥：《鄂州血史》）丙午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死义者“逾万人”，湘籍志士居多数。刘道一被捕后，敌人行刑逼供，他大呼曰：“士可杀，不可辱，死则死耳！”（谭延闿：《刘道一》）杨卓林、廖德璠、李发群被捕后，“卓林知祸已迫，廖、李且不免，乃一以自任，且骂且起，前掀案，案折，谓事与彼二人无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之杨卓林耶？速杀我，毋及无辜！”（《醴陵县志·人物志》）禹之谟在受绞刑时，质问刽子手金蓉镜：“我要流血，为何绞之，吾热血不流，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蓉镜曰：“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之谟笑曰：“好、好，免得赤血污坏。”（姚渔湘：《禹之谟就义记》）大义凛然，慷慨就义。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的刘复基临刑犹连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等口号不止。“二次革命”失败后，蒋翊武遇难前，作绝命诗四首，发出“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的嗟叹，表现了他坚贞不屈的气概和忧国忧民的情操！辛亥革命时期为警醒同胞而采取自戕行动的著名蹈海三烈士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都是湖南人。五四运动时期的湖南反孔健将易白沙也是因为不满军阀混

战而南下广州，在端午节的晚上投江自尽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革命志士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更激励了他们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涌现出了像夏明翰、郭亮、毛泽民等一代英烈。三湘英烈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成为我们效法的楷模！

#### 四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列强的频繁入侵，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消极、沉沦下去，而是奋起抗争。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提出了种种救国方案，并将其一一付诸实施，导演了一场又一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史迹向世人表明，帝国主义不仅在当时不可能灭亡中国，而且永远也不可能灭亡中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实践中，湖南人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湖南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面为洞庭湖，地形呈口袋形。两宋以来，中国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由湘北入注、积淀，故“湘人以守旧闻天下”；然而，伴随着近代中国三次留学运动高潮的出现，湖南的有识之士成批地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在他们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下，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湖南，与传统文化发生猛烈的碰撞，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汇，势必引发激烈的冲突。加以湘军被裁撤以后，不少湘军将领利用手中积累的财富大量兼并土地，而数以万计的湘军士兵则沦为流落江湖的无业游民，这就使本来已经尖锐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加剧了。近代湖南已经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维新与守旧、革命与反革命，其斗争尖锐、激烈的程度是全国所仅见的。复杂的斗争环境往往容易造就政治型人才。总之，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湖南人才中尤以政治家为最多。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历次重大事件中，几乎都可以找到湖南人的身影，曾几何时，湘籍政治家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人物之

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杨度所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语，诚非虚言！因此，研究湘籍政治家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著名的政治家往往又是杰出的思想家。长期以来，史学界有关湘籍政治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湘籍政治家也出版过不少传记，有的政治家还出版过多种版本的传记；但是对湘籍政治家思想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有的政治家思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的甚至付诸阙如。基于此，我曾于2001年初向文学院领导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出版《近代湘籍政治家思想研究》丛书的论证报告，并同时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申报了出版该丛书的选题。我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文学院和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文学院拨款予以资助，并委我为该丛书主编，出版社亦将此选题列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于是，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启动。本人虽然对于湘籍政治家思想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但深感才疏学浅，实难担此重任，可为了推动这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确保该丛书最终完成，我只得勉为其难，承担起这份义务和责任；并重申我在《纪念魏源逝世130周年暨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上提交论文的基本观点（详见拙文《近代湖湘文化的源流、结构及其特征》，《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权充序言。

2003年10月10日

# 目 录

## ◎引言 蔡锷研究综述 /1

## ◎第一章 维新变法思想 /18

### 第一节 早期的经历和思想 /18

#### 一、早期的经历 /18

#### 二、传统思想的影响 /23

#### 三、湖湘文化的熏陶 /27

### 第二节 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31

#### 一、认识孔夫子 /31

#### 二、认同三世说 /37

#### 三、认从光绪帝 /39

## ◎第二章 民主革命思想 /43

### 第一节 反清革命思想 /43

#### 一、从维新转向革命 /43

#### 二、践行军事救国 /49

#### 三、发动云南起义 /56

#### 四、反对君主立宪 /63

### 第二节 反帝制复辟思想 /67

#### 一、定策反袁 /67

#### 二、联合抗袁 /76

#### 三、起兵讨袁 /83

#### 四、迫袁退位 /88

#### 五、再造民国 /95

## ◎第三章 国权思想 /108

### 第一节 国权思想的形成 /109

### 第二节 收回利权思想 /115